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显示,西周至汉初 曲刃青铜短剑曾纵横东北亚

本报记者 郭 平



战国时期地形图,当时燕族已融入燕国。

造型独特的“辽宁铜剑” 使用时间超800年

由辽宁师范大学领衔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与中原农耕民族交融史研究,意图通过民族交融这一视角观察辽宁的历史文化。中国古代青铜器是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博士张盟研究方向的重点,提到曲刃青铜短剑,若干年前关于这种带有明显东北地方特征的青铜器所引发的争论,他仍然记忆犹新。

争论是在考古界展开的,争论的焦点是应该将使用这种青铜器的辽宁先民与哪个北方民族的族属进行对应,专家们的意见有所不同。之所以会产生争论,一方面受制于考古资料的缺乏,另一方面,在中原地区已经进入到了较为发达的青铜器时代,生活在辽宁地区的先民虽然持有少量的青铜器,但是社会组织形态仍然处于原始部落,或者部落联盟状态,没有文字留传下来,中原文明还将这里视作蛮荒之地,记录的文字少之又少。

张盟以多份研究报告提到的朝阳县十二台营子古墓为例,为我们还原了学术界对于曲刃青铜剑的认知过程。

这一古墓是于1979年发现的,隶属朝阳县十二台营子乡袁台子村。古墓为土坑木棺墓,人骨架保存完整,单人仰身直肢葬,头东足西,男性,50岁左右,随葬各类遗物三十余件,铜剑放置在右侧盆骨上,双环合铸,短剑曲刃,短剑上残存麻痕。

吸收中原文化的再创造

张盟说:“从考古发现看,曲刃青铜短剑不是舶来品,多是在本地铸造,这从同一类文化遗存出土的石范中可以得到证明。”

但是,铸造青铜短剑的技术却不是原发的,因为在其出现之时,中原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马承源先生编撰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介绍,“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据化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铜、锡合金,或有少量铅,一类是铜、铅合金或者铜、锡、铅合金,以铅居多。青铜的硬度随着锡含量的增高而增强……古代的工艺奴隶对于青铜中含锡的不同而改变其物理性能,是有其清楚的认识的。”

春秋晚期,齐国有一部工程技术书,名为《考工记》,就记载了自钟鼎以下六种不同含锡量的青铜器,称为“六剂”。

春秋时期的越国是铸剑名邦,越王剑中有一种镶嵌剑,甚至采用了二次铸造的方法,将剑刃镶嵌在剑体当中,以达到剑身兼有坚硬和柔韧的优点。

与之相对,出土于东北各地的曲刃青铜短剑则在合金的处理上,尚远达不到同期中原文化的水平,但是辽宁的先民在剑的造型方面充分发挥出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剑身的弧曲和早期非常明显的剑突。

从目前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看,很多出土的此类短剑都有使用过的痕迹,有的剑刃部留下了精心打磨的印记。

至于青铜短剑到底属于我国北方哪个族群,引发争论的焦点后来集中到确定哪一处遗址出土的曲刃青

这一古铜文化类型比较复杂,其中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在辽宁多个青铜器时代遗址中都有发现,先后出土数量多达一百余把。

这种青铜短剑形状独特,它由剑身、剑柄和石枕首等3个独立部分组成;柄首横长中空,空腔内嵌有一个石制的枕首,多为比重较大的铁矿石类,通体磨制,两端圆而鼓,中腰凹进;剑身插于剑柄的喇叭形口内,组装后如丁字形,所以有人将其称为“丁字形剑”,此外,短剑的剑身均有圆柱状突脊,故有人又称之为“柱脊剑”。当然,这种青铜短剑的剑身更为明显的特征是刃部有较大的弧度,并在剑刃中部铸有一个突尖。由于其独特的剑身造型,有国外学者将其命名为“琵琶形剑”。

这种青铜短剑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陆续出土,吸引了诸多国内外考古领域专家学者的目光,因此除上述称谓外,它还被赋予了多个名称,因最初多见于辽宁及东北,日本考古界称为“满洲式铜剑”“辽宁式铜剑”等,还有“双侧曲刃短剑”之称,吉林大学林沅先生称之为“东北系铜剑”。

从考古发现情况看,这种曲刃青铜短剑曾经在东北亚地区有着非常顽强的生命力,从西周中晚期直到汉初的800多年间,其古朴的形状和明显由其演化而来的短剑在很多遗址中都有发现,甚至对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青铜短剑样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短剑年代更早一些上,以便排列出源流关系。

当这一争论逐渐为陆续产生的新发现所扰动后,专家转换了一下思维,从使用青铜短剑族群的延续中来寻求答案。

战国中晚期,随着燕国“却胡”“灭貉”“筑长城”等系列措施,拓展并巩固了疆土,几乎将辽宁全境都纳入了中原势力的版图,这为我们寻找青铜曲刃剑的流向留下了一些线索。

文献记载,战国时期与燕相邻,在辽东的东面还有一个民族——貉。貉族与燕人关系密切,似乎在习俗上与燕人很相近,因此,这一时期在大、小凌河流域与燕关系极为密切的三种遗存,多被考古学家视为与貉有关。它们之间的共性为:都以土坑墓为主,有木椁,都出土东北系铜剑,随葬品中都有燕式陶器,年代差距不大,以往研究者多将它们统称为“凌河文化”晚期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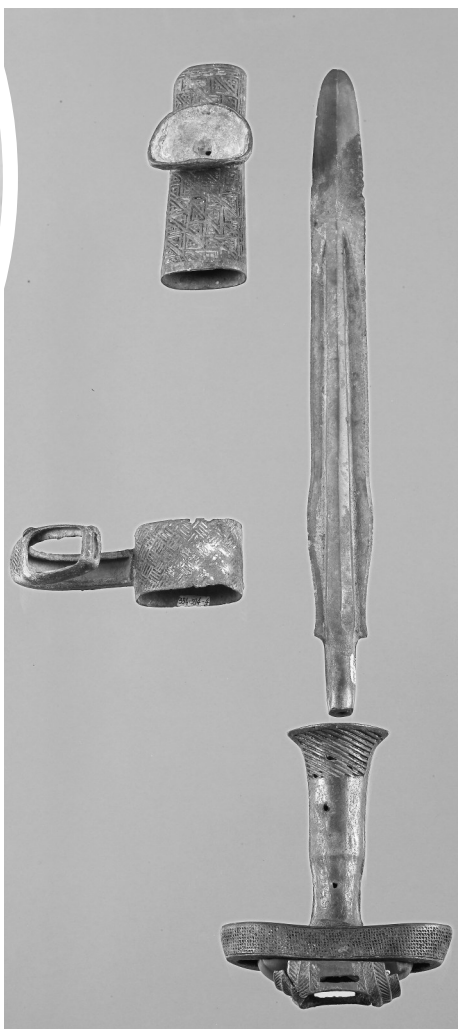
而一度被认为与曲刃青铜短剑关系密切的“东胡”则恰恰相反,目前在考古界初步断定为汉代及以后由东胡延续而来的乌桓、鲜卑等考古遗存中,找不到任何与曲刃青铜短剑及其相关器物有渊源关系的迹象。

有学者认为,这类铜剑作为武器不具有实用性,是以一种象征性为主的器类,可能属于古代东北地区盛行的萨满教所使用的一种法器。然而观察青铜短剑,曲刃和剑突是在有限的剑身长度内,尽量加大锋刃的长度,从而增加了切削的效果,这也或许与貉人喜欢烧烤野味有关。

张盟说:“但这只是一种推测,需要得到考古实证才能确立。”

为了解并有效保护这处墓地,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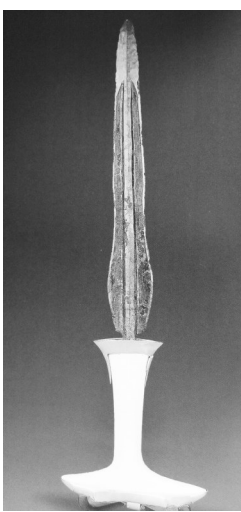
核心提示
辽宁地区先后出土了100多把曲刃青铜短剑,其使用年代从西周中晚期开始直到汉朝初年,跨越了800多年,还辐射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其本身就反映了辽宁先民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与再创造。



青铜短剑的剑鏢、剑钩。



阜新市博物馆馆藏的曲刃青铜短剑。



葫芦岛博物馆收藏的曲刃青铜短剑。



本溪市博物馆馆藏的曲刃青铜短剑。



葫芦岛市博物馆收藏的曲刃青铜短剑。

交融始自文化认同

翻看史料,关于民族关系的记载当中,有很多关于战争的记录,如《史记·周本纪》中“明年,伐戎。明年,伐淮夷”等,这是以事件为节点记录历史,不可避免留下的缺憾。

项目首席专家、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玉君说:“战争只是民族关系当中一种激烈的表达方式。历史上,北方游牧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交融在更多的时间里还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交流、交往等较为平和的方式进行。”

曲刃青铜短剑的主人,辽宁地区的先民——貉人,同中原文化的交往方式,从有限的史料中反映出来的多属于后一种。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燕……北邻乌桓、夫余,东结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东夷秽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降为苍海郡”……

张盟说:“貉人与中原文明能够以较为平和的方式交往,从考古发现看,首先是基于一种文化的认同。”

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中以获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东大杖子墓地最具代表性。

东大杖子古墓群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建昌县碱厂乡东大杖子村,背依燕山余脉,面对大凌河川,地处华北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上。

为了解并有效保护这处墓地,从

2000年起,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三级文物部门联合在“东大杖子”进行了多次考古勘察。其中已发掘战国时期古墓44座,出土各类随葬器物近千件。墓葬从规模上可分大、中、小型三种,其中大型墓主要位于墓葬区的中南部,较为集中,中、小型墓葬在其周围间杂分布;均为土坑竖穴木椁墓,分为填土与封土墓两类。其中出土的金柄东北系短剑十分珍贵。

超过200座以上的墓地规模,发现有长宽近10米大型墓葬的等级,随葬成套大型精美燕文化铜礼器及具有东北土著文化特点的三柄曲刃青铜短剑,配以金柄套,诸多因素均表明:这是一处在辽宁乃至东北亚地区前所未见的等级很高且保存下来的一处战国时期具有浓郁土著文化色彩的墓地,对研究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我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专家指出: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辽宁以貉人为代表的先民当时虽然保留了很强的自身文化特点,但也明显受到了燕文化的影响。早在秦开却东胡之前,辽西一些土著民族对中原文化已经高度认同,这是燕文化向北发展的重要基础。

可以说,正是认同并逐步吸收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辽宁的先民才与后来进入这里的农耕民族一起揭开文明进程崭新的一页。
(本文照片为资料图片)

秦朝可能在燕国遗址上扩建碣石宫

本报记者 郭 平

考古一区主体建筑东南角发现异常

葫芦岛市的姜女石碣石宫遗址研究有新成果。

从1981年发现姜女石秦行宫遗址开始,国家和辽宁省的专业考古力量围绕遗址的保护和研究,进行了长期的工作。

目前,在姜女石秦行宫遗址中规模最大、保存状况最好的是石碑地遗址。

经过数次发掘验证,考古人员认识到,遗址所在地原始地表的形势总体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与遗址周围的地势大体相同,原地表土为黏土,下为基础岩石。遗址之所以成为高于四周的台地,是因为后期人类建筑活动的结果。

考古发掘时人们注意到,遗址中的早期建筑是在原地表上挖浅槽后夯筑基础部分,随后对基础进行回填掩埋,形成高于四周的台地,此后在夯筑的基础上修建宫城。

从发掘情况看,遗址中的建筑大体分为两期,结合两期建筑遗迹中的出土文物分析,第一期出土文物多见夹贝卷云纹瓦当,尤其是夔纹大瓦当,这是秦代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构件,考古人员据此推断第一期宫城遗址最初建于秦代。一期建筑废弃一段时间后,其凹凸不平的地表又经过了人工修整,并在遗址南部远小于第一期建筑范围内修建了第二期建筑,这个时期建筑遗址中伴随出土的有“千秋万岁”瓦当,由此判断其年代不晚于西汉中期。

第二期建筑废弃后,遗址中再没有发现其他建筑活动。

在多年的发掘、清理过程中,考古人员非常清楚姜女石秦行宫遗址基础的夯筑情况,筑板每板长3米,宽0.25米至0.3米,土质采用较为纯净的黄土,清理时,考古人员还多次发现板痕上有很多圆形浅坑的戳迹,推测为当年检验夯土质量时留下来的,部分反映出秦代对建筑质量要求的严格。

然而,正是在清理这处遗址时,考古人员发现了异常。

研究者发现,紧挨着明显为秦代夯土的是厚约8厘米的黄土,下面一层则是夹杂有炭粒的同样厚约8厘米的红烧土,再下面则是厚约0.63米的黑色灰土。同上面秦代夯土的基础一样,三层夯土同样转角清晰,表明他们是人工建筑的结果,只不过看不到筑板的痕迹。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教授华玉冰在编撰考古报告时已经注意到这个异常,指出“因为秦代夯土基础此前尚未发现其他质地与颜色者,所以这段特殊基础颇令人关注。”

华玉冰推测,这段基础属于不同时期,烧土以下部分可能属于早期的建筑基础,其上为秦代补建。杂有炭粒的烧土层很可能是早期建筑地面及其上部分的倒塌堆积。

战国时期,燕已经建碣石宫

记者查找到华玉冰当年撰写的博文《碣石与碣石宫》,其中讲了战国时期燕国的几个故事。

关于战国时期燕国的碣石宫,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有:“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这段话讲的是战国时期的邹衍到了燕国,燕昭王拿着扫帚清除道路为他作先导,并请求坐在弟子的座位上向邹衍学习,还曾为他修建碣石宫,亲自去拜他为老师。

邹衍是战国末期齐国临淄人,阴阳家代表人物,五行创始人,主要学说是五行学说,“五德始终说”和“九州说”,因他“尽言天事”,当时

人们称他“谈天衍”,又称邹子。

《史记》记载,邹衍目睹了那些掌握一国之权的诸侯们越来越荒淫奢侈,不能崇尚德政,不像《诗经·大雅》所要求的那样先整饬自己,再推及百姓了。他于是就深入观察万物的阴阳消长,撰写了《终始》《大圣》等篇共十余万字。

当年的王公大人初见邹衍的学说,感到惊异并引起思考,受到感化,到后来却不能实行。不过,邹衍却因此在齐国受到尊重,他到魏国,梁惠王远接高迎,同他行宾主的礼节。到赵国时,平原君侧身陪行,亲自为他拂拭席位。

至于燕昭王为什么要为邹衍特意修建一座碣石宫,人们推测与邹衍的身份有关。邹衍是战国后期著名的阴阳家,与当时俗称为方士的人属于同一类型的人。

那么对于这座碣石宫的具体地点,《史记》中并没有详述,数百年后,唐代有一位擅长地理研究的学者名叫张守节,他编著《史记正义》,其中对燕国的碣石宫进行了考证,认为燕昭王建的这个碣石宫在幽州薊县西三十里,宁台之东,即今北京所属大兴区附近,这一说法得到许多专家的赞同。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燕国的碣石宫取名可能与地点无关,是出于与邹衍身份相配的名称。

可能是燕国方士的聚集场所

事实上,自从姜女石秦行宫遗址发现异常夯土遗迹之后,对于它的研究和思考就没有停止过,华玉冰说:“也有爱好者提出了‘燕王三台’的观点。”

这是一个燕昭王广招贤才、复兴燕国的故事,《战国策》有较详细的记述。

燕昭王在燕国被攻破之后即位,他以自身的谦恭和丰厚的礼物来招揽贤才。他对郭隗说:“齐国趁我们的国内混乱没有防备,攻破了燕国,我深知燕国国家小、力量弱,不足以报仇。可是如果得到贤士一起来治理国家,雪洗先王的耻辱,这是我的愿望啊。先生看到有这样合适的人才,我会亲自侍奉他的。”

郭隗说:“假若大王一定要招致贤士,那就先从我郭隗开始。至于那些比我更贤能的人,难道还会以千里为远而不来吗?”

昭王于是给郭隗改建了华美的住宅,并像对待老师那样用最高层次的侍礼礼敬侍他。这时乐毅从魏国到来,邹衍从齐国到来,周辛从赵国到来,贤士们争着奔赴燕国。

此后,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和秦、楚以及赵、魏、韩等国共同谋划,发兵征讨齐国,齐军战败,燕国得以复兴,名列战国七雄。

当然这段昭王筑台纳贤的史事一直为古今所称道,古今不少文人墨客出于对前代业绩的敬仰,纷纷考证燕王台的旧址,众多的说法大都指向现今的河北境内。

不过,史料中对于战国时期的渤海之滨还是有一定的描述,在《史记·封禅书》中有:“自威、宣、燕昭使人人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

这样描述海上仙山的都是什么人呢?多是那些方士。司马迁这样说这些人,自从邹衍凭借阴阳说名扬诸侯后,燕齐地区海上的方士纷纷效仿他,又不能取得声名,不过一些荒诞奇怪、阿谀逢迎、苟且聚合的人从此兴起,其人数之多不可胜计。

如果从这段记述来分析,或许在秦以前,姜女石秦行宫遗址很有可能是一处战国后期方士们的海上“活动中心”。



姜女石秦行宫遗址中石碑地遗址发掘现场俯视图。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